



神农书系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SARD)编
温铁军 孔祥智 主编

解读珠三角： 广东发展模式和 经济结构调整战略研究

温铁军 等著



SARD

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



神农书系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SARD)编
温铁军 孔祥智 主编

解读珠三角： 广东发展模式和经济 结构调整战略研究

温铁军 等著



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解读珠三角——广东发展模式与经济结构调整战略研究/温铁军等著.
—北京: 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0
ISBN 978-7-80233-859-3

I. 解… II. ①温… III. ①经济结构-调整-关系-经济发展-研究-
广东省 IV. ①F127.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99374 号

责任编辑 张孝安

责任校对 贾晓红

出版发行 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

北京市中关村南大街 12 号 邮编: 100081

电 话 (010) 82109708 (编辑室) (010) 82106624 (发行部)
(010) 82109703 (读者服务部)

传 真 (010) 82109709

社 网 址 [http:// www. castp. cn](http://www.castp.cn)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 刷 北京富泰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 mm × 1 230 mm 1/32

印 张 7.875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0.0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
《神农书系》

编委会

主 编

温铁军 孔祥智

编 委

(按姓氏音序排列)

白南生	孔祥智	刘金龙	马九杰	Scott Rozelle
孙中才	唐 忠	汪三贵	王志刚	温铁军
曾寅初	张利庠	郑风田		

总序

科学研究与问题意识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随自身科研竞争力的提高，从建院第5年的2009年起资助本院教师科研成果出版，是为神农书系。本文针对学术界之时弊而作，引为总序。

一、问题：关于科学的问题意识

1. 科学不必“实技求术”

20世纪80年代，中国进入新一轮对外开放的时候，我被公派到美国学习抽样调查和统计分析^①；第一次上课教师就先质疑社

① 本序作者于1987年在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工作期间，被上级公派去美国密执安大学进修社会科学研究方法（1980~2000年的20年里先后3次去了以方法论见长的社会调查研究所ISR和ICPSR进修学习）；后续培训则是在世界银行总部直接操作在发展中国家推进制度转轨的援助项目；随后，即被安排在中国政府承接世界银行首次对华政策性贷款的工作班子里，从事“监测评估”和应对世界银行组织的国外专家每年两次的项目考察评估工作；这就使作者本人在1980~1990年的农业部门有了与世界银行从发达国家聘请的经济专家直接对话和从事较高层次的涉外研究项目的机会。因此，当年被人戏称为农村政策领域中的“洋务派”。此外，作者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即介入了第一个专业的“中国社会调查所”的早期研究，1988年参与了“中国民意调查中心”的民间创办，1990~1992年实际主持了“中国人民大学社会调查中心”的创办和科研工作；还在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直接操作过以全国城乡为总体的抽样调查，后来在农业部负责过多项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以县级为总体的抽样框设计和调查数据分析。20世纪90年代以来则参与了很多国家级科研项目的立项评估或结项评审。因此，本文实属作者有感而发，目的在于立此存照。



会科学的科学性！问：什么是科学成果？按照自然科学领域公认的实验程序简而言之——只有在给定条件下沿着某个技术路线得出的结果可被后人重复得出，才是科学成果。

亦即，任何后来者在对前人研究的背景条件有比较充分了解的情况下，假如还能沿着其既定的技术路线重复得出与前人同样的结果，那么，这个前人的研究，应该是被承认为科学的研究……如此看来，迄今为止的大多数社会科学成果，都因后人难以沿着同样的技术路线重复得出与前人同样的结果，而难以被承认为科学！由此得出，无论东西方的研究只能转化为对某种或者某些特定经验归纳出的解释性的话语。

由于这些话语的适用性在特定时空条件下的局限性，因此，越是无法还原那个时空条件的研究，就越是体现了人们追求书斋学术的“片面的深刻”的偏执。

也许，除了那些“被意识形态化”了的话语因内在地具有政治正确而不应该列入科学性讨论之外，人类文明史上还不可能找到具有普遍意义或者普世价值的社会科学成果……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社会科学研究强调的科学化虽然在提法上正确，但在比较浮躁的意识形态化的氛围之中，却可能成为普遍化的学术造假的内在动因。因为，很多以“定量分析”为名的课题研究尽管耗资购买模型而且有精确的计算，却由于既缺乏“背景分析”，也没有必须的“技术报告”，而既难以评估，也难以建立统一标准的数据库。更有甚者，有些科研课题甚至连做研究最起码的“基本假设”都提不出来，有些自诩为重大创新的、经院式的理论成果，却需要进一步讨论其理论逻辑与历史起点是否吻合等基本常识……

这些实际上与科学化背道而驰的缺憾，往往使得后人不能了解这种大量开展的课题研究的真实依据。如果科研人员不知道量化分析的基本功，不了解数据采集、编码和再整理以及概念重新界定等各个

具体操作环节的实际“误差”，就很难保证对该课题研究真正意义上的科学评价。对此，国内外研究方法论的学者多有自省和批评。

再者，由于很多课题结题时没有明确要求提供受国家基金资助所采集的基础数据和模型，不仅客观上出现把国家资金形成的公共财产变成“私人物品”的问题，而且后来者也无法检验该课题是否真实可靠。

何况，定性和定量作为两种分析方法，本来不是对立的，更没有必要人为地以此划线，非要偏向某个方面才能证明研究课题的科学性。

可见，科学研究还是得实事求是地强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不必刻意地“实技求术”，甚至以术代学。

方法无优劣，庸人自扰之。如果当代学者的研究仍然不能具备起码的科学常识——理论逻辑的起点与历史经验的起点相一致，则难免在皓首穷经地执着于所谓普遍真理的进程中跌入谬误的陷阱！

2. 农经研究尤需分类

如果说，早期对于不同方法的学习和实践仅形成了对“术”的分析；那么，后来得到更多条件从事大量的与三农发展有关的国际比较研究之后所形成的认识，就逐渐上升到了学的层次。诚然，面对中国小农经济的农业效率低下、农民收入徘徊的困局，任何人都会学看发达国家的农业现代化经验，但却几乎很少人能看到这枚“硬币”的另一面——教训。

我们不妨从农经研究的基本常识说起——如果不讨论未涉及工业化的国家和地区，那么，由于农业自身内在具有自然过程与经济过程高度结合的特征，在世界近代通过殖民化推进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文明史中没有被根除，因此，工业化条件下的世界农业发展分为三个异质性很强的不同类型：

一是前殖民地国家（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为代表）的大农场农业——因殖民化造成资源广大的客观条件而得以实现规模化和



资本化，对应的则是公司化和产业化的农业政策。

二是前宗主国（欧盟为代表）的中小农场农业——因欧洲人口增长绝对值大于移出人口绝对值而资源有限，只能实现资本化与生态化相结合，并且60%农场由兼业化中产阶级市民经营；遂导致一方面其农业普遍没有自由市场体制下的竞争力，另一方面与农业高度相关的绿色运动从欧洲兴起。

三是未被彻底殖民化的原住民为主的东亚传统小农经济国家（日本和韩国为代表）的农户经济——因人地关系高度紧张而唯有在国家战略目标之下的政府介入甚至干预：通过对农村人口全覆盖的普惠制的综合性合作社体系来实现社会资源资本化，才能维持三农的稳定。

由此看来，中国属于何者，应该借鉴何种模式，本来也是常识问题。

如果做得到“去意识形态化”讨论，那就会愿意借鉴本文作者更具有挑战性的两个观点：

其一，依据这三种类型之中任何一种的经验所形成的理论，都不可能具有全球普适性。

其二，这三种类型之中，也都没有形成足以支撑“农业现代化”并称之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成功典范^①。

中国于1956年提出“农业现代化”的目标，一方面，当时在发展模式上全面学习苏联，并为此构建了意识形态化的话语体系和政策体系；另一方面，客观上也是迫于城市工业部门已经制造出来的大量工业产品急需借助国家权力而下乡的压力——如果不能完成工农两大部类产品交换，改革之前30年的国家工业化是难以通过从“三农”获取原始积累来完成的。

时至今日，虽然半个世纪以来都难以找到几个投入产出合理的

^① 温铁军. 三农问题与世纪反思. 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2006年第1版。

农业现代化典型，人们却还是在不断的教训之中继续着 50 多年来对此照搬于先苏后美的教条化目标的执着，继续着对继承了殖民地资源扩张遗产的发达国家农业现代化经验明显有悖常识的片面性追捧。

显然，这绝对不仅仅是农经理论裹足不前的悲哀。

二、学科基础建设只能实事求是^①

以上问题，可能是国家资助大量研究而成果却难以转化为宏观政策依据、更难以真正实现中国话语权藉学术研究走向国际性的内在原因。甚至，令学术界致毁的、脱离实际的形式主义愈演愈烈，真正严肃的学术空气缺乏，也使得这种科研一定程度上演化成为各个学科“小圈子”内部分配——各种各样的人情世故几乎难以避免地导致学术造假和教育腐败的普遍化。

我们需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实事求是地抓好基础建设。

首先是清晰我们的问题意识，从本土问题出发深入调查研究；敢于挑战没有经过本土实践检验的理论观点。当然，一方面，要放弃我们自己的意识形态化的讨论；另一方面，同时尤须警惕海内外任何具有意识形态化内涵的话语权争论被学术包装成科研成果；尤

^① 2004 年暑假，当我以 53 岁高龄被“引进”中国人民大学、担任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之职的时候，曾经有两种选择：其一是随波逐流、颐养天年；其二是最后一搏、厉振科研。本能告诉我，只能选择前者；良知却迫使我选择了后者。执鞭至今 5 年有余，在校领导大力支持和全体教职员工共同努力下，本院借国家关注“三农”之机一跃成为全校最有竞争力的院系之一：教师人均拥有国家级纵向课题 1.5 个，人均拥有课题经费 30 万；博士点从 1.5 个增加到 4.5 个，还新组建了乡村建设中心、合作社研究院、可持续高等研究院、农村金融研究所 4 个校属二级科研教学机构。期间，我虽然了解情况仍然不够全面，但对于现行教育体制问题的认识还算比较新鲜；再者，在这几十年来的“三农”研究中有很多机会与国外著名高校开展学习交流，或在几十个国家农村做考察，也算有条件做些比较分析。于是，便就科研进一步服务于我国“三农”问题的需求提出这些建设性的意见。

其是那些被广泛推介为具有普适性的理论。在农经界，主要是力戒邯郸学步和受以术代学等多年来形成的恶劣学风的影响。

其次是改进定量研究，如果我们确实打算“认真”地承认任何一种新兴交叉科学在基础理论上的不足本身就是常态，那么对于新兴学科而言，最好的基本研究方法，其实恰恰是“后实证主义”所强调的试验研究和新近兴起的文化人类学的参与式的直接观察，辅之以采集数据做定量分析。同时，加强深入基层的科学试验和对个案的跟踪观察。近年来，国外相对比较先进的研究方法讨论，已经不拘泥于老的争论，而是开始从一般的“个案研究”演变为资料相对比较完整、定性和定量结合的“故事研究”。我们应该在现阶段仍然坚持定性定量分析并重的原则，至少应该把参与式的试验研究和对不同个案的实地观察形成记录，都作为与定量分析同等重要的科学方法予以强调。否则，那些吃苦耐劳深入基层从事调查研究的学者会越来越少。

最后是改进科研评价体系。我们在科研工作中应该修改开题和结题要求，把支持科研的经费综合统筹，从撒胡椒面的投入方式，转变为建立能够容纳所有国家资助课题的数据库和模型的共享数据系统，从而，对研究人员的非商业需求免费开放（个别需要保密的应该在开题前申明），以真正促进社会科学和管理科学的繁荣；同时，要求所有课题报告必须提交能够说明研究过程的所有环节出现的失误或偏差的“技术报告”（隐瞒不报者应该处罚）；要求任何重大观点或所谓理论“创新”，都必须提供比较全面的相关背景分析。

既然中国人的实事求是传统被确立为中国人民大学的校训，那就从我做起吧。



2009 年国庆中秋双节于北京后沙峪

前言

区域经济比较与广东产业升级

——关于和解放思想相关的广东经济结构调整问题^①

不论人们主观上如何评价中国变化中的意识形态，也不论客观上中国的制度供给者如何借鉴了互相对立的发达国家的体制，历史进程展示给人们的只不过是：中国政府在完成了内向型的国家工业化的资本原始积累之后，符合产业资本扩张规律地推行了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由于后任政府继承的仍然是直接获取农村剩余的政治经济制度，也就必然在 20 世纪 90 年代推进的激进改革之中遵循内涵于 1950～1970 年的工业化原始积累形成产业资本的制度之中隐含的“路径依赖”约束，于是派生出以政府公司化为本质的政府直接扮演双重角色的中国特色的政府市场经济。

无论利益取向不同的人们如何看待这种后发工业化与国家政治建设密切结合的变迁，都不得不正视这样的事实——中国尚未像众多被迫或被诱导推行了冷战遗留下来的西方体制的其他亚非拉人口

① 本文修改稿曾经发于 2008 年 12 月《珠江经济》，此次成书时作者又有修改。2008 年完成的调研报告最初并不具有公开发表的可能，作者也为报告中客观批评较多而对委托方颇有歉疚感。但不久发生的经济危机验证了这些批评，也使本书有了公开出版的价值。



大国那样落入贫困的陷阱和主权丧失的危机之中难以自拔。以中国的个别发达地区为中心的思想理论界虽然因有条件接轨、有条件立足于西方中心主义价值体系而内在地具有对垄断体制的批判性，因而也就内在地具有了西方主流思想喜闻乐见的进步性；但其至今不能主导当代“思想解放运动”之根源仍在于代际延续地、孜孜以求地诠释着西方对中国基本现实的百年误读。

本报告讨论的主要是当前的紧迫问题——人类进入工业文明以来的历史经验，一再表明如下基本事实：无论信奉任何“主义”，居于任何类型的政府治理下，只要在这种产业资本形成之后进一步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就都会有调整带来的社会代价（或称“制度成本”）。而广东珠三角的结构调整却在应对全球产业资本重新布局的挑战时得天独厚，“本地承担”的社会代价相对较低。其客观原因恰恰在于20多年来低收益的“吃租经济”特征——与低端制造业相伴随，没有给外来打工者以“本地待遇”。由此笔者认为，真正的创新在于通过大量调查研究从而“去意识形态化”、实事求是地分析广东经济模式的形成与当前结构调整面临的问题，以期为广东发起的“第三次解放思想”提供必要的脚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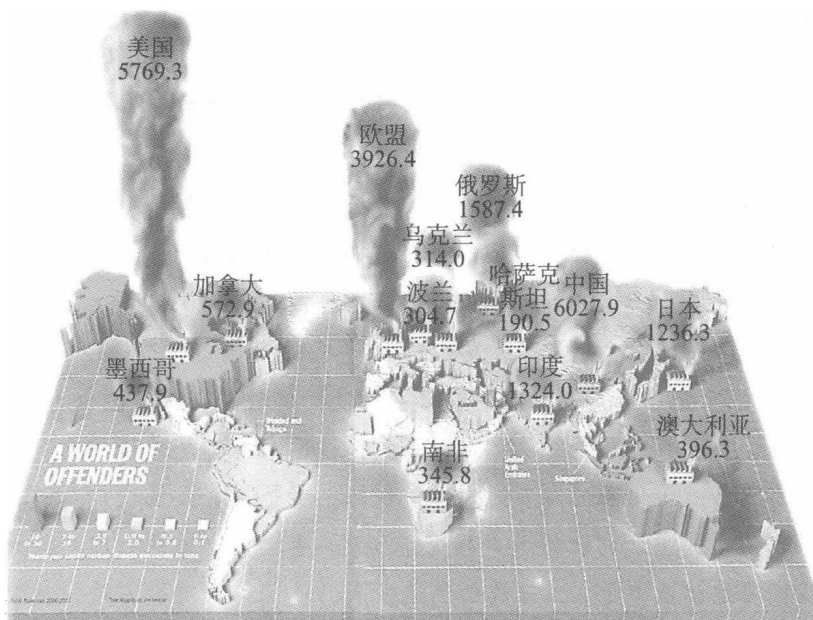
1. 背景分析：怎样认识我们身处其中的世界

我们现在正身处全球已经被裹挟进入的资本主义时代。这个时代被马克思生动地称为人类的资本主义文明阶段，其特质是，当资本被人制造出来成为异化于人的异化物或称“他者”之后，即大规模地将人和人依存的资源异化为生产力要素，所以在资本完成这个人类和资源被异化的历史时期，就是人类的资本主义文明阶段。

如果以相对论为认识工具来看，人类进入资本主义文明几百年的发展期间，开始面临这种异化伴随的新的挑战，那就是生态灾难和生存危机。

通过显示各国二氧化碳排放量的世界地图，可以看到，黑烟排放最多的是中国、美国，接着是欧洲。那些黑烟小的地方是南亚、非洲、

拉美等地区，这些地方基本上仍然处于传统农业和资源经济阶段。



2007 年世界二氧化碳排放示意图

注：①单位：百万公吨(英)；②数据来源：IEA 全球能源二氧化碳排放报告 2009；③2007 年全球 CO₂ 排放总量为 28 962 百万公吨(英)。

也许，面对新挑战的世界已发生了很重要的但我们还认识不足的变化。比如，西方人说 21 世纪引领世界经济增长的四部发动机叫“金砖四国 BRIC”——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那么，从二氧化碳排放量的世界地图看其英文首写字母排序，B 巴西是不冒黑烟的地方；R 俄罗斯虽然冒了些黑烟，但是资源存量比较大；接着是 I 印度，尚未完成工业化资本积累；然后就是 C 中国^①。世界进入 21 世

① 加入全球化之后仅短短几年，中国在二氧化碳排放方面就迅速超欧赶美；2008 年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已经和美国并驾齐驱，并且成为美国新政府调整之后的对华战略的新内容（作者注）。



纪之前，这四个并不冒黑烟，或者虽然有黑烟但不太大的地方，成了世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这难道不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新趋势？

又如，在中国人欢呼着全球化加速的同时，最近世界 38 个国家发生了粮食危机，法新社提供的材料中显示面临粮食危机的国家包括中国。尽管我们自己并不这么看，但是实际上仍需要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研究农村问题的人早在三年前就开始强调：我们的基本农产品（粮食、棉花、油料等）进口折抵中国这样土地利用效率极高的农业生产方式的耕地，已达 3 亿~4 亿亩（1 公顷 = 15 亩，下同）。1996 年，中国政府发布的耕地总面积是 20.5 亿亩（其实应该是 21 亿亩）。经历了短短 12 年的高速发展，据说还剩下 18 亿多亩，亦即减少了大约 3 亿亩。可见，这两个指标是硬碰硬的——城市化、工业化高速发展而大规模占地，于是粮食大量进口——占了 3 亿亩的土地，就得进口相当于 3 亿~4 亿亩土地的产出。如果我们要继续城市化、工业化的高速发展，就仍需大规模占地，就要继续大规模增加进口。

那么，中国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能不能靠大规模进口来维持基本农产品需求？就在国内对这个问题争论不休的同时，世界范围内粮食的生产率，如玉米、大米、小麦的生产率却在下降，这个趋势也是不可逆转的。

有鉴于此，当我们思考目前中国的区域发展，涉及广东现在的解放思想和经济结构调整的时候，首先要考虑到人类不分贫富、种族、国别所面临的共同威胁——怎么才能够应对气候变化导致的生态灾难这个最大的挑战，这仍然是一个人类如何理性存在的问题^①。

^① 杨帅，温铁军．发展生态农业的国际经验及本土试验．环境保护，2008（15）。

今天，当新的人类共同威胁出现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人类社会开始有了积极意义的调整，从原来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随殖民主义传播到全世界所形成的一元文化统治，转变为一种新的趋向：开始承认多样性，承认多元化，承认了生态文明的基本理念和框架。我们今天正在进入的这个新时代——从人类的资本主义文明时代进入到人类的生态文明时代，这个时候，尤其需要解放思想。

秉持中国传统文化提出的“和而不同”，是形成生态文明理念的重要内涵。

很多人信奉自由主义，却未必知道被一般老百姓信奉的自由“Freedom”，与被英语语境之中的政治家们赋予了制度内涵的自由主义“Liberalism”，和更多带有意识形态化特征的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的差别。即使认同自由主义，也应该明确其核心理念是承认多样性。是承认别人的生存和思考都有其客观合理性，于是才会有“尽管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是我捍卫你的发言权”。如果勉强别人服从某个只维护一种普世价值的舶来的主义，甚至为此党同伐异，其实已经违背了人类自由的核心理念。

另一方面，解放思想也应该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信奉者们如何从原来被第三国际和斯大林主义所过度教条化、利益化的状态中解放出来的问题。不要再把当年马克思提出的五个阶段论当作一元论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理念。因为，不同的人类文化形态本来无所谓优劣。因此，多元论与一元论，可能是当前需要深刻反思历史观的大问题。我们的解放思想需要扬弃以前只允许信奉一个被某种主流确立的绝对真理的主观唯心主义历史观。其实，当资本主义与生俱来的生态环境危害使人们感受到共同的生存威胁时，可能就会愿意回归到多元社会，亦即，多元论和多样化，很可能是人们正在进入的新历史阶段必然发生的思想认识方面的讨论课题。



因此，对解放思想的反思应该是：解放思想既不是“我解放你”，也不是“你解放我”，而是鼓励大家“共同讨论，兼收并蓄”。有点思想高度的进一步要求则是：如果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愿意自我解放，那就得每一个人先自我反思。

众所周知，西方中心主义源于海洋文明，包括我们今天信奉的古希腊和古罗马，作为西方文明发祥地，本身是如何起源的？这其中有很多需要探讨的地方。为什么在西方的大博物馆收藏的文物里到处看到的都是战争、杀戮、抢劫、分赃；而在东方的博物馆的文物之中，包括古埃及的博物馆里，一般找不到历史上有记载同类主题的雕刻及绘画？在埃及“上王国”时期的墓葬出土文物的博物馆中，见到的几乎都是千人一面的群体文明画面，个体与个体之间没有明显的差异，展现的是群体文化的形态。也许由于依靠群体灌溉才能形成的农业文明，并不像古希腊和古罗马依靠采集和狩猎生存而需要突出个体强健的西方文明。由此进一步的问题是：地中海沿岸所形成的欧洲中心主义的文明是否在全世界具有普适性？或者甚至是所谓“普世价值”的？世界本来是一个多样化的世界，那么上古世纪的人类发展线索是如何分野的？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们之所以出现严重的不平衡，原因又是什么？

根据 OECD 出版的著作，在西方列强侵略中国之前的 1820 年，按照国民生产总值计算，中国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一，占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的 28%——比英法两国的总和还要多。中国人看“大国崛起”，需知那时候急于崛起的，是在大量对华贸易逆差导致白银危机压力下的西方小国，而中国在殖民主义侵略之前从来就是长期存在的世界上经济总量最大的国家，自不必誓言崛起；需知秦汉以后延续的国家制度只要相对稳定，就会不断地出现能够延续百年的所谓“盛世”；需知小农经济家庭内部普遍存在着劳动力过剩，使得中国农村家庭经营内部化的工商业劳动力的回报可以长期低于农业

劳动力的回报，这些才是中国历来对外贸易竞争力很强、并长期保持贸易顺差的核心机制^①。

倘若循源上溯至秦汉时期，秦朝代价极大地实现了“书同文，车同轨”，是自“汉承秦制”以来大一统文明不绝、两千多年长期统一的重要基础。中国两千年前就有了统一的文字，乃至统一的可传播教化的文化——历经无数次内外战争都没有因分裂而毁灭的文化，甚至外族入主中原形成政权，也不得不按照中原的文化传统和典章制度来办事。

绵延到当代，我们正在进入四大文明时代，即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生态文明。需引起注意的是，中国几千年来小农家庭村社制的内部化的合理分工，既可能解释为“新制度学派”指出的“内部化处理市场经济的外部性问题”，也可能一直就不是西方那种市场化造成严重外部性的社会分工。只有家庭经营（包括村社经济）才能导致大家可以不计自己的劳动代价地去投入，因此，家庭经营的农工商文明在中国早期历史就已经形成，并且与西方文明之最大不同，也是中国在近现代资本主义史上都仍然与西方迥异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性特征。

之所以归纳家庭经营时包括着村社经济，在于现代的中国沿海地区的地方工业化，特别是近半个世纪的乡村工业化，也因为土改之后社区内部不能解雇劳动力——哪个村里能够把谁家开除“村籍”？这是无法做到的——农村社区成员便由此具有天然占有本社区资源、财产和收益分配的权利，因此，社区所有制是成员权的集合表现。

这些经验层次的归纳在西方理论中几乎没有，而在中国却是自

① 我们归纳中国小农村社制经济的特点之中，具有一种劳动力资本的家庭组合投资不同于西方个体化的劳动力要素投入特点。可参阅刘怀宇，李晨婕，温铁军，“被动闲暇”中的劳动力机会成本及其对粮食生产的影响，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8（6）。